

两岸民族作家的文学坚守

——第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玉梅

8月22日至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新地文学发展协会主办,《新地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大溪文艺之家协办的“第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以吉狄马加为团长的大陆多民族作家、评论家代表团一行16人和台湾的20多位作家、评论家、学者(其中包括11位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会议。26位作家、评论家提交了论文及文学作品,会议期间共举办了9场次的演讲、研讨、座谈及朗诵等文学交流活动。大家围绕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选择、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的坚守与嬗变、两岸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差异性与共性、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独特价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且一起交流创作经验,共叙文艺艺术人生与民族文化情怀,极大地增进了两岸作家的情谊,促进两岸的文化和文学交流。

最大公约数:促进两岸交流的新发展

自2012年首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会举办以来,交流会便成为两岸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深受两岸多民族作家、评论家的喜爱和期待,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台湾文艺作家协会、新地文学发展协会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的85岁高龄的新地文学发展协会理事长郭枫说,他和中国大陆的交往很密切,今年几乎每个月都会到大陆。这样奔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进度。现在两岸经济的交流已经到了深水区,下一步,文化的交流是促进两岸交流的重要工作,而在文化层面上,文学是文化的精髓。他认为两岸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的奇葩。少数民族文学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表现出来的真诚、真情、自然、质朴、热情等,有自身的独特魅力。交流会由台湾和大陆轮流举办,已经成为一个制度,促进了两岸民族作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深化了两岸文学的交流合作。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大陆与台湾少数民族是文化同源、文化同源,台湾少数民族也是大陆少数民族的一个缩影。我们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比如傣族文化与泰雅人的文化之间有很多的相似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常常心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在一起都是兄弟姐妹,进行心灵的沟通,可以增进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开阔作家的视野,促进两岸的文学交流和文化交流。两岸的文化交流,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除了两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出版,重要作家的推介,还需要形成一种合力,推动中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不断提升大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使整个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些都需要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

台湾文艺作家协会理事长、小说家陈若曦说,大家都是写作者,应该坦诚交流,优点、缺点、写作技巧等,无可不谈,只要能提高文学创作,就是最大公约数。台湾的少数民族族群人数不算多,但其文学创作富有成就,是台湾文学园地一朵亮丽的花朵。台湾四面环海,最大版图是高山,高山文化和海洋文化在世界文学版图中也独树一帜。譬如写到海洋,我们作家歌颂人和海洋的拥抱,共荣、共存,而不是现代文明长年追求的“人定胜天”、征服和利用海洋。写到山,则凸显人对高山的敬仰,对自然和万物取之有道,处处和谐相处。这些作品也记录部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哀叹部落和文化传承渐趋式微的危机。消费自然、破坏自然以致物种灭绝、地球暖化,这些都是全球的共同课题,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大陆少数民族,人数更多,相信作品也丰富多彩。每一次面对面互相切磋琢磨、互相鼓励的机会都非常难得。

台湾诗人詹澈说,在历史上,当人类的发展面临问题时,少数民族文化总能为人类的亚洲注入新的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两岸的和平才能带来亚洲的和平、太平洋的和平。在这其中,除了要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文化交流。因此,以长远眼光来看,作为个人在创作的时候,是为个人的文学理想进行的创作;而作为一个平台,文学创作是在做更具有长远

意义的事情,可以为两岸的和平与人类的和平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责任与使命:在文化觉醒中面向未来

吉狄马加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文化觉醒中面向未来”的发言。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命运与价值。第一、当下无论是讨论一个单一国家的文学,还是讨论一个单一民族的文学,都离不开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考验。在“全球化”的现实威胁下,保护和延续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变得越发重要。“全球化”所形成的强大的商业逻辑的侵入,不同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包括文学)遭到商业力量的压迫,依然是当今全人类保护文化(文学)多样性急需解决的难题。只有真正改变了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文化伦理这一谬论,世界的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才会发生根本的逆转,并朝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第二、尊重和承认差异,是中国乃至世界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美国的民族问题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可比性是很小的。因为从总体上看,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原住民印第安人所占人口比例微乎其微,而中国的各个民族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就是个迁徙进入中国的外来民族,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有的历史还更长,早已完全本土化。只有认真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才会具有完整的科学性,每一项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才会更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三、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处于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极大的发展,这是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觉醒的结果。众多优秀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宝库,它们不仅是某个民族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文学的光荣。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把其文学的触角真正深入到了其母体文化根部的最深处。他们一方面让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另外在创作中更加关注民族的当下生存状态,而且把自身民族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呈现文学民族性的同时,还极其高明地呈现出文学的人类性。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新奇迹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

与会少数民族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表达了对文学、对民族文化热爱与坚守。台湾作家浦忠成说,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没有讲母语、方言的环境,但是自己的母语非常好,而且母亲是部落头人的女儿,讲了大量的部落故事,使之认识自己的部落文化。台湾少数民族族群有着悠久而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他们的文学作品拉长了台湾的历史文化视野,而且他们生活所在的高山、海洋和山谷,都让文学内涵更加丰富。两岸民族作家需要互相了解,进行更深刻的交流。

台湾作家卜袁·伊苏玛哈单说,他热爱母语写作,感觉用自己的族群文字写作时,心灵中最深刻的内容才得到更恰当、更得体、更完美的表达。他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族群文字写作,又用简单的汉语翻译出来,以便跟汉语读者进行交流。他认为,每个民族在世界上都有共通性,比如爱与真善美,作家就是要选择最好的语言表现世界上人的共通性。

台湾作家瓦历斯·诺干著述甚多,各种文体均有涉猎。他于1991年创办《猎人文化》,为了给杂志写稿,跑了很多民族地区,获取了大量的写作资源。但他的作品并非都是以台湾少数民族生活为背景,其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战争残酷》主要关注到了第三世界,写到了车臣战争,写了巴勒斯坦,还有一篇写“二战”时期日本在东北的细菌战。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关注点和视野应该宽阔一点,把普世价值写得更广一点。一个民族人口可能少,但是文学可以发挥最精湛的书写模式,走到世界的前沿。

多位作家都谈到自己早年走出去,多年后再回到自己的部落,回到自己的族群,通过写作回归自己的民族文化家园。

台湾作家夏曼说,他在地学习工作16年后重返部落,通过自己的创作表现独特的海洋文化,他的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岛屿、自己的族群。台湾作家里慕伊·阿纪说,她开始只是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有一段时间甚至把自己的族群语言都忘记了。后来参加族群认证考试,收集很多泰雅人文化,了解自己族群的神话传说故事,是写作让她慢慢走向自己的族群。台湾作家亚荣隆·撒可努曾经是一名森林警察,参加过镇压族群反抗政府的活动,是写作让他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回归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不但写作还创办了“猎人学校”,传承部落文化。

坚守民族文化并非易事,但是作家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台湾作家巴代说,作家就是要给自己的族群留下一些民族文化的记忆。自己这一代还能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一代不写,下一代就没有人写了。年轻的“80后”作家沙力浪以母语布农文创作,他说自己用右手写汉语,用左手写母语,用汉语是为了跟更多的人对话,而用族语是对母亲、对族群的责任。对他来说,用族语写作很困难,因为他用汉语思维,写作时需要转换成族人的思维,他个人还停留在自己的部落寻找自己。羌族作家雷子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有多长,羌族文学的历史渊源就能上溯到多远。羌族是一个悲壮而顽强的民族,自己是一个幸运的羌人,是一粒在历史长河中被幸运传递的那枚倔强的种子。古老的羌族文化是其创作的源泉,此生注定为民族而歌。

作家的民族文化认同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畲族作家山哈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但是以前并没有太多的民族身份认同,直到2009年参加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55个少数民族作家通过4个月的学习和交流,有了关于民族文化的自觉,从此有意识地走进自己的民族生活,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佤族作家袁智中说,正是因为民族文化面临着全球化的危机,甚至是最终可能被同化的命运,所以作家更需要写作,还要拍摄,做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录者。继第一部佤族历史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之后,她重返部落,力图为佤族当下的社会生活及发展变迁留下真实而深刻的记录。

关于文学的主流与边缘问题,台湾联合大学教授、小说家王幼华说,不论什么族群,拿出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主流。壮族作家唐樱说自己从来没有边缘感,她所属的黑农壮保持着比较原生态的壮族文化,其创作就是要将自己民族中美好的东西和独特的文化介绍给读者。

作家雅森·孜拉力在发言中介绍了新疆维吾尔族悠久的文学传统和发展状况。据统计,新疆目前维吾尔族作家有1.5万人左右,100多个地、州、市、县成立了文联、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杂志有21种,还有《新疆日报》等200种报刊设立了文学栏目,全区内11个出版社都有文学编辑部,99%的维吾尔族作家用母语创作。1950年以来,在新疆用维吾尔文出版的长篇小说超过300部,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几千部,诗歌集好几万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作家在文学继承中更需突破和创新。台湾作家启明·拉瓦说,我们处在一种多样化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的传统是否在变,文学的样貌是否有改变,文学中的变与不变分别是什么,这都是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近十年来倾心主编民间公益网站——藏人文化网,以此作为互联网时代的藏族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平台,带动、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他说,建设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创作主题明确、创作体裁多元、团结协作奋进、发展态势良好的作家群,还需要藏族作家继续努力。在新媒体时代,作家还需要走出自己民族的土壤,需要与其他民族一起分享这个时代,而不是回到几千年前。土家族作家田耳说,面对“返回民族和走出民族”的论题,他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走出民族”是他本已具有的一种写作策略或者说写作自觉,而“返回民族”,则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他将一直追寻这个过程,从而确证自身的存在,挖掘自身可能潜藏的种种可能。

穹庐一曲本天然

□叶梅



■新视野

程度上不仅当时影响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并或许延续到他们的一生。

多年的编辑生涯,使兴安成为一个阅读量很大的评论家,而他对他作家及作品的看法,超越了一般的办刊人,他不光是从刊物的需要出发,更多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看潮起潮落。他带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一边广泛与作家们交朋友,一边对他们的作品加以评说,他以他的视角提出一些专业研究者并非均能认可但却充满活力的观点。他断定:“60后:文学的怀疑主义者,历史废墟的拾垃圾人”,“70后:尴尬的一代,可望后发制人”,“80后:我们没有见过的‘外星人’”。他在新世纪尚未到来之前就提醒传统的作家评论家要多关注各种类型的写作,包括网络文学,他认为“文学肯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载体和工具的变化,而是更深刻的内在结构和叙事观念的变化,除非我们不再需要它”。他总是比较早地对一些新人新作发表看法,心悦诚服地为他(她)们叫好。有一次他和安妮宝贝一起参加《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举办的传媒文学大奖,那时这位女作家的名字在文坛还不甚响亮,但兴安发现在座的大学生们在主持人介绍到她时,全都齐刷刷地站起来热烈鼓掌。吃惊不解的兴安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发现确实代表了相当一大批年轻读者的心声,有着“疗伤”的功能。他将这些观点写进了文章,显示了一位相对成熟的评论家的包容和开放,以及对一拨拨文学新人的提携。或许正是如兴安以及更多类似的努力,才使得今日文坛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星星。

他对少数民族文学情有独钟,近年来十分留意多民族文学的崛起,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从不同民族的写作中把握不同民族心理及独特性、母语写作及翻译的多种可能等。他还经过个人的深切体验,反复思考如何看待草原民族剧烈变化的生存状态,蒙古包在不断消失,骑马射箭成为一种记忆,大多数牧民住进了温暖的砖瓦房,开始喜欢汽车与摩托、电视和手机,现实与想象已然存在着一道裂缝。草原城市化和过度开发同时带给人们无尽的忧患,如何让生活越来越好,又不损伤民族的根基,更不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兴安觉得:“对于这些矛盾的阐释和见证才是作家应该关注的焦点,一个民族能够立足于今天的阵痛,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起点。我们的作家必须真诚面对。”

兴安的文字如同他的性情,不受拘束,又让人读出温度,读出真情和思想。金代诗人元好问写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送与兴安倒也贴切。这些年里,兴安的工作环境多有变换,惟一不变的是性情,他对文学仍如同初恋的情人始终不渝,虽然时有沮丧但初衷不改。他喜欢游历山川,热爱美食,如今有了微信,他不会不时将所感受的美景美食拍下来,晒在手机上,让朋友们共赏。他还喜欢收藏一些不一定很值钱但颇有趣的玩意儿,奇石、茶具、碗合和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之类,分享给大家。最近又在苦练书法和水墨画,汉文蒙古古文相得益彰,一幅幅“苍狼”、“蒙古人”,劲道十足。尤其蒙古文的书法,墨汁饱满,像是要奔突,展现出兴安的自我及浓烈的情感,而他画的蒙古马更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收藏,并被国内一些文学杂志介绍推荐。

有人说,兴安人到中年,却还是一副文艺青年范儿。的确,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位与文学结缘的活动家,一个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人。但他虽然兴趣多样,却从未在某个范围摆出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他只是自由地行走和表述。而他的评论只限于文学,在生活中从不是是非,更不加重于人,即使批评也是善意厚道的。显然,文坛因为有了他,便多了情趣;也因为有了他,便多了朋友。

这些,在他的文字里都能读到。

8月29日至30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民族风情与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来自日本南山大学、福冈国际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韩国中央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到会,提交了60余篇学术论文。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从理论上阐释古典文学与地域文化、民族风情之间的关系构成及研究视角转变的可能性、合理性,关注古典文学中主流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关系之间的多元交融关系。其中,部分专家学者就“明代贵州移民诗人与地域诗风考论”、“清代贵州女诗人郑淑昭抒情诗艺术论”、“明清笔记中的贵州影像”、“明代贵州提学官员与地方社会”、“宋代贵州文学的民族风情”等富含“贵州元素”的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寅认为,本次研讨会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民族风情与地域文化,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王远白)

中外学者研讨古典文学中的民族风情